

巨大 的 转变

越南战争期间的
中美关系

张秀阁 □ 著

巨大 的 转变

越南战争期间的
中美关系

张秀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巨大的转变——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张秀阁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35-4743-0

I. 巨… II. 张… III. 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1961—1975 IV. 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7165 号

巨大的转变——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

责任编辑 冯 研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明明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字 数 20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内 容 摘 要

越南战争虽然只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场地区性的冲突，但无疑是影响 20 世纪后半叶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影响到中、美、苏各自的战略利益，在战后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中国，在 1950—1975 年的两场越南战争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先是 20 世纪 50 年代帮助越南赶走了法国殖民统治者，后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通过援助越南抗击美国，迫使美国在越南撤军从而使越南赢得了国家的独立统一。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关系一方面因在越南的间接对抗一度严重对峙，另一方面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中美两国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对抗到缓和。美国和中国在越南的对抗模式值得我们深思：中美两国作为分别支持越南南北两方的国家，相互对抗，两国关系几乎处于危险的关头；但正是在这相互对抗中孕育出双方走向缓和的种子，美国为寻求从越南脱身，向中国抛来了“橄榄枝”，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又坚定不移地迈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本书试图借助于越南战争这样一个平台，梳理中国援越抗美决策的过程，探讨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脉络，考察中美关系中的越南因素。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一再将中国界定为“最危险”和“最肆无忌惮”敌人的情况下，为什么却接受北京的警告，愿意将越南战争的升级局限在相对的范围内？两个完全不同意识形态以及利益追求严重对立的国家之间，为何能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走向缓和？对于这段历史的深入探讨，可以使我們了解越南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全面干涉越南，又为走出越战泥沼寻求与中国的缓和，这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的世界格局，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参照。

序

秀阁的博士论文《巨大的转变——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即将付梓，因我曾做过她的指导教师，秀阁要我写几句话，便只有从命了。

秀阁的研究目的非常明确，她是以中国援越抗美为切入点，将讨论问题集中于越南战争期间中美关系的演变，旨在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作出贡献。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越南战争发生在战后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国际格局从两极逐步向多极过渡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中美两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对于越南的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且对越南战争的进程产生影响。援越抗美是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既坚持援越抗美，又在出兵的形式和规模上谨慎行事，由此成功地把战争限定和控制越南南方，同时迫使美国不敢派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避免了中美在越南战场上的直接冲突。伴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中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对这段历史的深入探讨是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可以使我们了解越南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遏制中国而全面干涉越南，又为走出战争泥沼寻求与中国的缓和。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一再将中国界定为“最危险”和“最肆无忌惮”敌人的情况下，最终却接受北京的警告，将越南战争的升级局限在相对的范围内；两个完全不同意识形态以及利益追求严重对立的国家之间，为何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向缓和？这都是秀阁在研究中所要回答的。秀阁的研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对世界

◇巨大的转变◇

的影响力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日益成为当代世界事务的重大参与者。作为一个以和平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如何在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秀阁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从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多维视角分析越南战争期间中美关系的演变，充分利用国内外最新出版的档案文献、当事人回忆等资料，坚持论从史出发、史论结合，力求使研究奠定在坚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之上。毫无疑问，这对于国内学界拓展冷战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是大为有益的。书稿的不足之处，是偏重于文献的梳理，而论述稍显不足，尤其表现在分析总结中国在援越抗美和中美关系演变中的经验教训上，这是秀阁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是为序。

刘景泉

2011年12月21日

目 录

绪 论

- 一 选题意义 (1)
- 二 研究现状 (2)
- 三 创新与不足 (9)

第一章 越战前的中美、中越关系

- 第一节 中美在越南问题上对立的缘起 (10)
 - 一 美国“遏制”新中国和在越南的介入 (10)
 - 二 中国援助越南抗击侵略 (14)
- 第二节 越战前中国的对美政策 (22)
 - 一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试图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22)
 - 二 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共警惕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24)
 - 三 全面内战后中共反对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 (26)
- 第三节 越战前的中越关系 (31)
 - 一 中越建交 (31)
 - 二 中国援越抗法 (34)
 - 三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 (41)

第二章 中国应对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

- 第一节 日内瓦会议后中美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 (49)
 - 一 美国公然破坏日内瓦协议 (49)
 - 二 日内瓦协议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 (52)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的反应 (57)
 - 一 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 (57)
 - 二 中国应对“特种战争”的非特种手段 (59)

◇巨大的转变◇

第三节	中越两国在“特种战争”阶段的合作	(63)
一	中越两国对中国出兵援越的探讨	(63)
二	越南劳动党支持中苏分裂中的中国共产党	(67)
第四节	中国援越抗美的原因	(75)
一	保卫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	(75)
二	中苏关系变化的元素	(78)
三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外交中的第三世界	(81)
四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国内政局	(84)

第三章 中国援越抗美

第一节	越战升级与中国的对策	(88)
一	“北部湾事件”引起中国深切关注	(89)
二	中国对美国升级战争的反应	(93)
三	中国援越抗美的准备	(97)
第二节	中国出兵援助越南抗击美国侵略	(101)
一	中国出兵援助越南	(101)
二	中美在越战对峙中的克制	(108)
三	中美在越战中的有效信息沟通	(113)
第三节	中苏关系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117)

第四章 中美缓和与结束越战

第一节	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127)
一	“北极熊”成为中国的首要敌人	(127)
二	中国外交的困难与整合	(131)
三	美国的战略收缩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	(133)
第二节	中美关系在越战中的转变	(135)
一	中美双方改善关系的努力	(135)
二	基辛格秘密访华	(138)
三	尼克松访华与越战结束	(144)

结 束 语

- 一 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战略关系的最高准则 (150)
- 二 关于中国援越抗美 (151)
- 三 关于中美关系 (153)

参考文献 (156)

- 一 文献类 (156)
- 二 传记和回忆录 (157)
- 三 著作类 (159)
- 四 论文类 (162)
- 五 外文类 (164)

后 记 (167)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对于介入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而言，对外交往关系着本国利益的增减，而在战争时期则直接意味着生存与灭亡。套用中国一句古话：“兵者，国之大事”，我们可以说：“外交，国之大事也”。

经历了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日益成为当代世界事务的重大参与者。国际关系的重大进展有中国的贡献，国际环境的变迁同样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国际社会，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制定外交目标和方针政策时，首要考虑的必然是其自身利益。国家利益既是外交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又是外交的归属和魂魄。因此，任何以追求、维护、拓展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战略，都涵括着其在外交上确定的目标和方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的发展无不与国家利益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越南战争，虽然只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地区性冲突，但无疑是影响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它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影响到中、美、苏各自的战略利益，在战后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中国，在 1950—1975 年的两场越南战争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先是 20 世纪 50 年代帮助越南赶走了法国殖民统治者，后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通过援助越南抗击美国，迫使美国在越南撤军从而使越南赢得了国家的独立统一。

一般说来，越南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的、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两次局部战争，即抗法战争（1946 年至 1954 年 7 月）和抗美援朝战争（1961 年 5 月至 1973 年 1 月）。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援越抗法战争（1950 年初至 1954 年 7 月）和援越抗美援朝战争（1961 年至 1973 年）。

援越抗美援朝是中国参与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战争中，既坚持援越抗美援朝，又在出兵的形式和规模上谨慎行事，由此成功地把越南战争限定和控制越南南方，并迫使美国不敢派地面部队直接出兵入侵越

南北方，避免了中美在越南战场上的直接冲突。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中美、中苏和中越关系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美由敌对转变为一种实质上的准同盟关系，中苏由同盟走向敌对，而在战争期间曾接受中国巨大援助、与中国并肩抗美的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却逐渐走向疏远、甚至敌视。

美国和中国在越南的对抗模式以及中国与越南“同志加兄弟”模式值得我们深思：中美两国作为分别支持越南南北两方的国家，相互对抗，两国关系几乎处于危险的关头；但正是在这相互对抗中孕育出双方走向缓和的种子，美国为寻求从越南脱身，向中国抛来了“橄榄枝”，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又坚定不移地迈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而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的进程中走向分裂，进而转入全面对抗，随着苏越关系趋向密切，中越关系逐渐走向低谷。

本书试图借助于中国抗美援朝这样一个平台，梳理援越抗美决策的过程，探讨中国全力支持越南抗击美国的原因。对于这段历史的深入探讨，可以使我们了解越南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全面干涉越南，又为走出越战泥沼寻求与中国的缓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一再将中国界定为“最危险”和“最肆无忌惮”敌人的情况下，为什么却接受北京的警告，愿意将越南战争的升级局限在相对的范围内？两个完全不同意识形态以及利益追求严重对立的国家之间，为何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向缓和？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了解冷战时期亚洲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能够为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世界格局、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提供一个历史参照。

二、研究现状

越南抗美战争在世界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美国、越南、苏联乃至世界的发展进程都有重大的影响。据统计，美国研究越战的书籍达1.2万多本，有关的小说、杂志、电影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边境的战争，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专著要少得多。

（一）国内研究现状

1. 口述史与学术论文。

第一，以当事人口述史和回忆录形式叙述援越抗美事件。

郑士勇的《抗美援朝亲历记》（《春秋》1996年第3期），作者当时是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的中国援越部队111团4营的通讯员。王业传的《抗美援朝亲历记》（《江淮文史》1997年第3期），作者当时是高炮66师618团4连任指导员，随部队出国执行抗美援朝作战任务。蒋友钧的《难忘的援越抗美战争岁月》（《浙江档案》1998年第8期），作者1967年随师执行援越抗美的任务，收藏了一

些特殊档案和实物。涂光群的《回忆援越抗美》（《湖北文史资料》1999年第4期），作者是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从地方及部队抽调的文艺工作者，于1965年5月随援越部队赴越南战地服务。子衿的《抗美援朝的台前幕后》（《中国社会导刊》1999年第10期），作者当时是云南省委副秘书长。张兰升的《抗美援朝亲历记》（《春秋》1999年第4期），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67师608团二连任指导员，于1965年8月奉命到越南作战。马家祥的《援越抗美亲历记》（《春秋》2000年第5期，马家祥口述，曹光华、桑乐泉整理）。王克勤的《在援越抗美的日子里》（《文史精华》2001年第12期），作者1966年10月随援助越南的高射炮部队对越南对空作战。王正咸的《抗美援朝旧事》（《党史天地》2003年第4、5、6期），作者是上世纪60年代抗美援朝的普通士兵。文庄（系中国原驻越大使馆一等秘书）的《用鲜血凝成的中越友谊——追忆我国援越抗美部队的英雄事迹》（《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8期）、《风雨同舟话越南——出使越南经历访谈录》（《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2、3、4期，2003年第1、2、3、4期，2004年第1、2期）。马金案的《援越援老抗美亲历记》（《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9、10、11、12期，2002年第2、6、8、10、11期）。邓元凤的《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上、下）（1967—1968）》（《天涯》2006年第2、3期）。唐那碧的《越南记忆》（《江淮文史》2007年第4期），作者于1966年9月参加援越抗美。

第二，从军事角度考察中国的援越抗美行动。

黄明星的《援越作战琐忆》（《军事历史》1997年第4期）中指出，1967年秋，作者所在高炮部队直接入越参战，美军在侵越战争中使用了許多新式空袭武器，而作者所在援越部队装备简陋，却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充分发挥了旧式装备的威力，赢得了越南党和政府的高度好评。刘炳锋在《中美空军的第一次较量——援越抗美期间的中国人民空军》（《党史文汇》2001年第2期）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空军继抗美援朝后，与美国空军的第二次较量，再次以美国空军的失败而告终。金克的《“集火”近战显神威——我高炮部队援越抗美作战纪实》（《文史春秋》2002年第3期）一文，详细介绍了中国人越高炮部队作战的战况和战绩。孔宪东在《中国空军在援越抗美战场》（《百年潮》2003年第1期）中指出，1965年，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派空军高射部队入越轮流作战，与越南人民军防空部队紧密配合。文庄、黄华、高碧莲的《中国援越抗美支持部队出国40年回眸》（《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对中国援越抗美志愿部队的光辉历程进行了回顾，指出中国志愿部队用生命和鲜血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叶介甫的《中国空军在援越抗美战场写实》（《文史月刊》2006年第5期），介绍了我空军高炮部队如何在作战辅助设备落后、防区群山叠嶂、峡谷陡峭等不利的条件下，英勇抗击美军的大规模攻击。随着档案资料开放、部分回忆材料的发表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

援越抗美军事行动逐渐撩开神秘的面纱。曲爱国的《越南战争期间的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参见章百家、牛军主编的《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对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的真相到底如何,中国是怎样作出向越南派遣支持部队决策的、中国的支持部队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在越南究竟负有什么使命,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决策的形成,以及中国部队在越南工作、战斗的情况,作了一个综合叙述。邓礼峰的《援越抗美述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详细介绍了从1965年6月开始到1973年8月结束的援越抗美军事行动。

第三,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研究中国与越南战争。

近年来国内在越南战争的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李丹慧的《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对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以及在此期间中越关系的微妙变化作了深入的考察,指出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致使越南最终与中国决裂,而与苏联结成同盟。曲星在《中越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战略一致性与策略差异》(《国际政治》200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中越两国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根本战略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只是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更有利于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最终实现。李丹慧的《中苏在援越抗美上的冲突与矛盾(上、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着重论述了对越物质援助中的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对其发生的背景、发展变化作了历史的考察。沈志华、李丹慧在《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处于现实与理念的矛盾之中,现实要求中美实现和解,而理念要求中国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宫力的《援越抗美与中美关系》(《史志研究》2001年第4期),着重考察了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进行的大规模援助及其促动因素,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江英的《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参见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的《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65年7月至1973年8月派出支持部队32万人秘密进入越南,进行援越抗美作战,正是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中美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李丹慧的《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200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指出,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成为中国调整对美、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事实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态势及战略考虑的发展脉络。肖宗志的《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中南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着重论述了越南战争扩大化

和美国最后不得不从越南脱身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越南战争直接导致并加深了中美间的持续对抗，而结束越南战争、解决越南问题又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基础。李丹慧的《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在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越抗美；二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中国始终把握住既定援越立场，绝不拿原则作交易，从而取得了以小国关系带动大国关系发展的效果。李丹慧的《一场三者互动的智力游戏，引进“批判口述史学”观念——关于协助越南防空作战问题的访谈录、档案文献与学者研究》（《国际政治》2000年第2期），介绍了美国“批判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运用此方法，以协助越南防空作战为案例，对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建空军参谋长恽前程同志的访谈录、有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和学术评估。叶江的《越南和平谈判中的中国因素（1968—1973）》（参见牛大勇、沈志华主编的《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虽然越南和平谈判主要是在美国和越南之间进行，但是其中的中国因素不应忽视，作者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越南和平谈判期间的中国因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杨奎松在《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参见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描述了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对印支战争方针变化，即从支持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到转向联美抑苏。作者认为，印度支那毗邻中国南疆，美国又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因此，中国不能不把美国对印支的干涉和扩张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从而积极支持印支各国共产党人，甚至还将积极争取东南亚各国政权作为抗拒美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用革命方法夺取了中国政权以后，特别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冷战期间，毛泽东对印支战争的态度，如同他对中国整个外交政策的思考一样，既不能不受到他日趋激进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又不能不受到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中苏分裂及其后果的严重干扰。由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在印支战争政策上的时左时右，有时甚至前后矛盾的状况。吕桂霞的《“特种战争”与中国“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指出，面对美国在“南大门”的战争挑衅，中国政府从国际主义和维护越南独立统一的立场出发，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开始了“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李丹慧在《越战与中美苏越战略关系的重新定位》（2008年3月17—18日“冷战在东亚”日中韩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指出，1965年初至1970年初，随着越南战争形势

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挥剑断袂后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以及苏联实力膨胀对美转守为攻、展开全球性争夺，中美苏越之间各自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在印支战场这个大舞台上，四国构成的三角外交开始注入战略利益因素。中美苏越关系重新组合，其结果是中美实现和解，着手联合抗苏，中国实际退出冷战，苏联复又走向在亚洲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前沿。中国与越南关系呈现出恶化的前景，苏联则与越南结成盟友，转入与中国和美国抗衡的历程。潘一宁在《越南战争后期中越关系的演变（1968—1972）》（《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1968—1972年间的中越关系，正是东亚国际冷战格局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阶段，在这复杂的大背景下，中越关系不能不深受影响。由于中越两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不对称性及关注点的差异，中越“同志加兄弟”关系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至1972年初，当中美关系实现突破性改善时，中越关系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两国对立已基本上不可避免。翟强的《周恩来和中越关系》（2008年4月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指出，周恩来所面对的中越关系，是中国外交关系中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越关系中，既有团结合作的一面，又有摩擦分歧的一面。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同情并支持胡志明领导的革命，为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提供了大量支援；另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反对越南在处理与老挝和柬埔寨关系时的居高临下、包办代替、输出革命。翟强的《越南战争和约翰逊对华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 NO. 7》2008年12月）中指出，约翰逊在1965年上半年直接向南越派出军队，帮助南越政权和越共武装作战，但与此同时，他又记取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忽视中国警告而导致中国出兵朝鲜和美军作战的教训，因此在这一时期，约翰逊在作越战决策时，总是在考虑应如何打消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做出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举动。

第四，对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的比较研究。

李丹慧的《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着重考察了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进程中，美国一直将战争的界限控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只是以派出支持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了中美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并对其影响进行了分析。章百家在《“抗美援朝”与“抗美援朝”——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中指出，由于中美双方的原因，在这两场战争中，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形式和结果大不相同，第一次

是直接对抗,导致了两国的长期隔绝;第二次是间接对抗,对抗尚未完结两国就走上了缓和之路。陈兼、赫斯伯格的《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史林》2004年第1期),讨论了朝鲜战争初期中美之间“信息传递”的失败,在朝鲜战争经验的影响下,越战发生后,中美双方在制订战略时都将对方的可能反应作为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朝鲜战争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没有在越战重演,其“信息传递”的作用不应忽视。

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1964:越南战争升级与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参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提出关于中国与越南战争的新论点,作者指出,越战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变动的影响是有限的,并不像人们一般设想的那样直接、强烈,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是由综合和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毛泽东将经济建设扭转为备战,从侧面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2. 专著类。

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王贤根的《援越抗美实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郭明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解力夫的《越南战争》和《越南战争实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持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研究中的力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丹慧编著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该书依据各种解密档案和新的史料,以开放的视角,把中越关系放在冷战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尽可能站在公允的立场上发表看法,解读了越战时中、美、苏、越之间错综复杂的较量,因而成为目前中国学者越战研究的重要著作。吕桂霞的《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以越南战争(1961—1973)为背景,以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冷热度为主线,勾画了中美之间从对抗走到缓和的历史演变过程,为我们正确处理和更好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 国外研究现状

总的来说,对越南战争的研究,美国是研究比较深入的国家。美国学者尤金·K. 劳森(Engene. K. LawSon)所著《中越冲突》(*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一书(纽约Praeger出版社1984年版),是将中越关系置于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去考察,提供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越冲突的历史背景,但是作者对中越友谊、中越的一致性之处论述较少,对于矛盾分歧则重墨渲染、用力甚多,并且由于涉及中越关系内幕的不少数据尚未公开,因此作者只能勾勒出中越分歧的大致轮廓。

美国华裔学者翟强的《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China and Viet-*

nam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一书是利用中国新解密、刊布的若干档案材料, 结合美国档案以及越南、苏联史料写成的一本系统论述中国与越战关系的学术著作。翟强认为, 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呈现两重性——既合作又遏制: 一方面, 中国与胡志明领导的劳动党密切合作,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帮助越南赶走了法国殖民主义者, 打败了美国的进攻, 支持越南劳动党寻求独立自主和国家统一的目标; 另一方面, 中国领导人又时时力图遏制越南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倾向。因此, 翟强得出结论说, 中国与越南既是同志又是对手。翟强在论述中越关系恶化的问题时, 分析了中越两国自身的因素、中苏关系的因素, 甚至也谈到了美国因素的影响 (主要是中美改善关系对中越关系的负面影响), 但是基本上没有论述苏越关系的因素, 这使中越关系的发展逻辑出现了某种断裂。另外, 翟强的《北京与越南的和平谈话, 1965—1968》(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 Working Paper No. 18) 一书, 充分利用了中国陆续公布的重要档案文献, 对中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认为中国反对越南和平谈判与毛泽东要建立第三世界的领导权有很大联系, 而且想限制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 并且也想利用越战为他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获得国内的支持有关。

美国华裔学者陈兼的《毛的中国与冷战》(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一书, 不仅对中国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进行了剖析, 而且也对 1964—1969 年越战中对越南支持的国内外背景以及“同志加兄弟”式的同盟难以维持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作者在对一大批原始资料加以整理印证的同时, 还参考了美国的有关文献资料以及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大量档案和东欧国家的有关档案。在全书结尾处, 作者一反西方学术书籍罗列参考书的惯例, 而是将参考的原始资料和研究专著按章节组织成一篇长文, 并加以简明扼要的评述, 这样就极大方便了其他学者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利用。

2000 年 1 月 10—12 日, 以亚洲学者为主, 议题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香港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学者, 与会的中国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这些“智库”级中国学者, 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的越南政策, 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 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密, 同时阐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如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认为, 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 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十七度线, 避免中美两国军队在地面正面冲突, 否则, 这场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中国社科院的李丹慧指出, 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 实现